

臺灣都市街道命名的政治意涵與特色

講座日期：3月13日

主講人：黃雯娟（國立東華大學臺灣文化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地名學傳統的研究旨趣，是透過解碼地名的文化意涵，重新建構過去的地景，主要的研究觀點是視地名為地景的客觀文化投射。1980年代後，研究轉向從批判理論概念，探索地名命名的權力表達。

都市既是一個區域的發展核心，透過都市街道的命名，可以最直接展現主政者欲表述的政治意涵。考量歷史發展與空間差異，本文選擇北部的政治中心—臺北、南部的歷史古都—臺南，以及中部的規畫都市—臺中，作為臺灣街道命名研究的觀察個案。透過三個都市街道名的演變，比較分析國家權力對街道命名的文化政治展現，尤其著重在臺灣「殖民」與「去殖民」過程中，在不同街區空間下，街名的變動所展示的空間權力及象徵意義。

清領時期 市街命名與區域發展

府城街道命名的類型以地景類街名最多，又以寺廟類街名最為普遍，顯示府城寺廟遍布的特色，甚至也以廟宇為中心，組織聯境防衛系統。

臺北則受自然環境的阻隔、政治經



▲ 1895年〈臺北及艋舺、大稻埕略圖〉。(圖片提供／高傳棋)

濟發展脈絡的差異，一直處於「三市街」分區發展的狀態：艋舺街道命名，以經濟活動與地緣性格明顯的寺廟的主要依據；大稻埕市街發展快速，洋行、行會取代市集，成為街道命名的關鍵；此外，願景式地名（許多也是商號名），成為大稻埕市街最普遍的命名原則。臺北城內的街道數量有限，顯示出城內區域發展的局限性，街道主要以機關建物作為命名的依據，呈現較

為鮮明的政治性格。

臺中基本上仍是新興規畫區，隨著省會移到臺北府，市街的發展局限於東大墩街，處於開發未完成狀態；零星的街道除東大墩街與小北門為地標名外，仍以期待區域繁榮的吉祥雅字居多。

日治時期 藉町名改正塑造新認同

日本統治或國民政府治理，主政者往往藉由官方所推動的地名更名，作為修正歷史的一種手段。比較日本時代的町名改正與戰後國民政府的街道更名，可發現基本的邏輯是一致的，都是希望藉由空間的重新命名，完成集體記憶的

汰換，塑造合乎執政者想像的新的認同指標。只是在操作上，「町名改正」下的町名，雖然基本上仍以日式風格或紀念性地名作為主要的命名機制，以重現殖民地臺灣的日本風格，但仍然部分保留清代舊有街名，甚至新的日本式町名的命名邏輯，除了重要人物的紀念性地名外，大部分也考量當地環境特色，給予相似意象的日式地名。顯然日本時代町名改正的原則，仍然考量在地的歷史與特色。

戰後 從中國化到本土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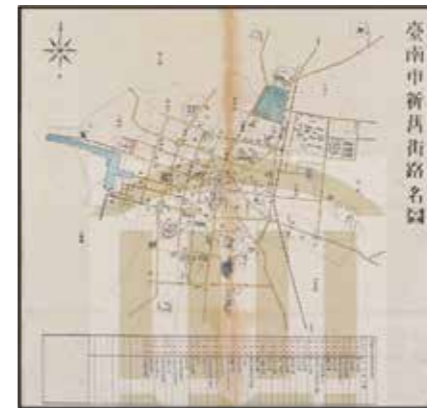
反觀國民政府的街道更名，初期的街道改正僅以去日本化為訴求，並回復不少前清舊有的街道名稱，但隨著大陸政權逐步失去，再加上「二二八」政治事件的發生，國民政府採取更為強硬的教化統馭，以加強對於臺灣主權的控制。因此，面對被日本殖民統治五十年的臺灣，著重去日本化與再中國化的教化改造，除了學校的民族精神強化與國語教育外，對於遍布各地的街道，更以鑲嵌中國民族精神、宣揚三民主義，以及強化領袖崇拜的意識形態命名，主導臺灣主要都市，即透過地名符號的象徵意涵，建構國家所欲強化的政治文化。

此外，臺

北、臺中、臺南三個城市也展現出不同的命名風格。首都臺北，以大量的中國地名式街路名覆蓋主要街區，此一命名策略也反映主政者國家治理的心態，即藉由中國式地名的不斷出現，建構在臺住民的大中國思維。

臺中從初期抹除原來日本化的色彩，轉換為充滿中華民族精神概念與光復建國意識形態的大中國符號命名後，慢慢回歸到依附於重劃區或行政區命名。但也因行政區名缺乏歷史與明顯地標的對應，道路名稱展現的空間次序性，也只能再次呈現計畫都市的性格。

至於文化古都臺南，自戰後初期第一次的街路更名後，並無大規模異動，雖仍出現不少中國民族精神、復興中華與三民主義相關路名，基本上仍以在地意象的街路名為主體。及至臺灣本土意識抬頭後，臺南以文化為主要訴求，在新增的街道路中，本地地名的重現已成主流意識，沒有中國地名式街道名，也成為古都臺南街道的顯著特徵，此也反映出臺灣都市街道命名的區域差異。



▲ 1945臺南市新舊路名圖。(資料來源：《續修臺南市志》，1996)



▲ 臺南市新舊街道名稱對照表。(資料來源：《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檔案》，1946)